

一、同盟會的渙散

同盟會本來就是一個鬆懈的團體，它自成立以來，對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就一直未達到思想認識上的一致，出現了政見分歧、爭執不斷的情況。到一九〇七年初，又因經費問題，光復會的章太炎等人對孫中山大加攻擊，並要求免去孫的職務。風波雖被勸止，但章太炎等對孫中山的攻擊卻有增無減。光復會中原來就有人（如徐錫麟）拒絕加入同盟會而分裂出去。他們另樹光復會的旗幟，表明同盟會早已開始分裂。到武昌起義之後，同盟會的組織由於妥協和各種遭遇，以及內外敵人的拉攏、瓦解活動，很快走向渙散，處於四分五裂，各自為政的狀態。例如，同盟會四川支部不經本部同意，逕自改為「共和黨」；孫武、劉成禺等聯合一些舊官僚和立憲黨人發起組織了「民社」；景耀月、歐陽振聲等，聯絡「國民共進會」等組織成了「統一共和黨」等等。

特別是章太炎在武昌起義後，於十一月間回到上海，十二月一日發表宣言，「承認武昌為臨時政府」，並認為不必等孫中山歸國，說什麼「有欲待孫君歸國始正名號者，此無異兒童之見」。

他並且「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極力貶斥孫中山。

當時，黃興在漢陽，曾就擴大同盟會問題徵求章太炎的意見，章太炎則回信以「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告之。接著，十二月八日，劉揆一又發表了同盟會、憲政分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一律取消的主張，這就更加加速了同盟會的解體。

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南京臨時政府剛成立，章太炎即正式脫離同盟會，在上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後又改名為統一黨）。章太炎自任會長，以程德全為副會長，接著又推張謇為「特務幹事」。³⁴章太炎在聯合會第一次大會講演中說：「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³⁵四日，他創辦《大共和日報》，並在發刊詞中宣揚「專制非無良規，共和非無稅政」。南京臨時政府已經公佈自一九一二年起改用陽曆，他卻在《大共和日報》第二號上以「本社社長」的名義，發表《宣言》說：「今日南北未一，觀聽互殊，豈容遽改正朔。況此次參事會，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變名，既非國民公選，何有決議改曆之權。故在議員未選，曆書未頒，對於此等少數空言，斷難遵行，願全國人民審思之，願各代表反省之。」

一月十四日，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在上海廣慈醫院，從而促使章太

34 章太炎說：「特務幹事，即領袖之異名，國有大疑，即當諮訪。」見《與張季直先生書》，載《大共和日報》第二號，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

35 《大共和日報》第二號，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

炎和同盟會的矛盾更加擴大。章太炎在三月時又將中華民國聯合會改名為統一黨，並在改黨大會的演說詞中說：「本黨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穩健為第一要義。」³⁶還在統一黨發表的《宣言書》中聲稱：「本黨本集革命、憲政、中立諸黨而成，無故無新，惟善是一。只求主義不涉危險，立論不近偏枯，行事不趨狂暴，在官不聞貪佞者，皆願相互提攜。」

章太炎還在《自定年譜》中講述當時建立統一政黨時的情況說：「初，同盟會著籍者不過二千人，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數千。武昌諸將，同盟會、共進會分處其半，以與南府不合，復立民社，與同盟會新附者競。余亦暫集人士為統一黨，……」當聯合會改為統一黨時，其組織力量是：「本部會員，現已達七百餘人，南方各省，大抵皆已設支部，北方亦可漸次擴充。」

總之，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後已明顯右傾。不論聯合會或統一黨，都不過是一種官僚、政客、立憲派的大雜燴。因此，它對南京臨時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無不加以反對。孫中山主張建都南京以牽制袁世凱，章太炎也極力反對。他公然為袁張目說：「遜位元以後，組織新政府者，當為袁氏，若迫令南來，則北方失所觀望」；³⁷「袁公已被選為大總統，大總統之所任，而百僚連袂歸之，此自事理亦然」；「袁公既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則名實自歸之矣，何必移統一政府於金陵」。三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黨人召開四川革命烈士追悼會，孫中

36 《大共和日報》第五十三號，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

37 《致南京參議會書》，《時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山親往參加，而章炳麟卻送來了一副對聯，其中上聯是「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但當時鼠竊狗偷的大半還是立憲黨人，而章炳麟不正是和他們沆瀣一氣嗎？他反對建都南京，認為南京並非龍盤虎踞，難道北京果真就是龍盤虎踞的地方嗎？很明顯，章炳麟為了反對孫中山先生，已經實際上站到袁世凱那方面去了」。³⁸

早在武昌起義後不久，立憲派與同盟會就展開了新的競爭。

當時，湖北、湖南、貴州等獨立省份相繼出現立憲派與革命派爭奪領導權的事件。張謇、趙鳳昌、湯壽潛等江浙立憲派陰謀在上海組織一個由他們控制的「專為對付獨立各省」的臨時中央政府。與此同時，在輿論上，他們群起攻擊同盟會「執政權而家天下」，並與同盟會分裂派聯為一氣，掀起一股解散同盟會的浪潮。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章太炎針對在鄂同盟會員譚人風等電請各省同盟會主要負責人前往武昌組織臨時政府的主張，極端錯誤地提出一個「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說什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又說：「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此論一出，全國的立憲派分子和舊官僚們如獲至寶，競相傳播，恨不得同盟會的解散，即刻見諸事實。張謇致函黃興說：「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此須與中山先生早及之。」那個從床底下拉出來當了湖北

都督的黎元洪更是推波助瀾，大加發揮，進一步提出了「革命黨消」的要求。於是，在這片喧囂聲中，同盟會面臨著一場新的嚴峻的考驗。

當時，同盟會多數領導者和同盟會員的頭腦是不清醒的，認識是錯誤的。他們所注意的只是爭取立憲派乃至舊官僚參加革命，而對如何鞏固和加強同盟會的革命領導作用則缺乏起碼的認識和重視。上海的陳其美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在張謇等人的拉攏和影響下，成了立憲派的親密合作者。宋教仁雖然主張保證革命黨人的領導地位，但由於他與趙鳳昌、張謇、熊希齡等人「相結納」，其結果亦不能不與主觀願望相反。特別是，對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叫囂，黃興固然拒絕採納，卻抵制不力，而宋教仁則隨聲附和，聲言他「將選擇同盟會中穩健分子，集為政黨，變名更署，與同盟會分離」。張繼、景耀月等同盟會重要活動分子更是「主張甚力」。景耀月公開表示：「凡他之團體或個人其奔走社會、在各方面竭誠運動者，皆寄託共和建設之健全分子」，因此同盟會應「易名改組」，「以招納熱心革命與運動共和之賢豪者」。譚人鳳這時也態度一變，說什麼「同盟會於未革命以前極為重要，今既革命，凡屬國民皆應一體致力於國家，不必各立黨派，各存黨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甚至公開鼓吹說：只有解散同盟會，才能「拯救黨派分歧的中國」。這些事實說明：在立憲派和舊官僚的進攻面前，同盟會已瀕於總崩潰的邊緣。

當然，這不是說同盟會內部沒有不同意見。比如，對擁戴黎元洪為都督的問題，就有人提出應改由同盟會員擔任。居正、田桐等為解決兩湖地區最高領導權的問題，還邀請一般同

志開秘密會議，由居正提議，擬公推黃興為湖北、湖南大都督。其中有同盟會員極力附和，等等。但是，這種不同意見僅僅是局部的、分散的，而且由於得不到大多數革命黨人的支持，它始終沒有在同盟會內部取得支配地位。

此外，革命黨人既害怕群眾，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企圖依靠立憲派頭面人物的「威望」來進行「有秩序」的革命，這也是原因之一。胡漢民在談到黃興這時的政治傾向時，就曾說道：黃「未嘗治經濟、政治之學，驟與立憲派人遇，即歉然自以為不如。還視同黨，尤覺暴烈者之只堪破壞，難與建設」。又說：「既引進張（謇）、湯（壽潛），為收縉紳之望，楊度、湯化龍、林長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強庇護，而克強之政見，亦日以右傾。」黃興這一思想演變，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革命黨人當時的精神狀況。

還有，由於武昌起義的勝利，同盟會內居功驕傲、爭權奪利的思想急劇地膨脹起來，內部矛盾日趨尖銳。他們為了取得某種地位元，拿原則做交易，以求得立憲派、舊官僚的支持，就是勢所必然的了。宋教仁為了達到當總理的目的，到處奔走，甚至要章太炎為他公開鼓吹。胡瑛被委任營口都督後，竟「對鏡顧影自豪，喃喃說道：周公瑾年少膺都督，我胡經武今日亦足比擬，何讓前賢！」就是一般會員，也有的認為「河山由我光復，權利自應我享」，有的「借同盟會三字鋪叫聲勢，冀可因利乘便」。這就不僅為立憲派和舊官僚提供了攻擊的口實，更為其拉攏、利用提供了可乘之機。正如孫中山後來所說：「維時官僚之勢力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只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奉迎阿諛，而漸被同

化矣！」

不過，孫中山這時還是比較清醒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從國外回到上海後，目睹同盟會被人利用的嚴重事實，憤然表示：「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並強調指出：「本會持三大主義宣導於世，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二者雖已將達而欲告成功，尚需多人之努力。況民生主義至今未少著手，今後之中國首須在此處著力。」隨之，為了整頓同盟會，他召開了有旅滬各省分會部分負責人出席的本部臨時會議，改訂了同盟會暫行章程，發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著重指出：由於同盟會內部不統一，「貪夫敗類，乘其間隙，遂作莠言，以為鼓簧，漢奸滿奴則又冒托虛聲，混跡機要，在臨時政府組織之際其禍乃大著」。同盟會「靈敏機關，剔其敗類」，實為「今日之急務」。為此革命黨人必須「先自結合，以成堅固不拔之群」，然後「廣益其結納，羅致碩人，以閱其力」。宣言還特別批判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論調，指出：「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勢，於本會所持之主義而亦懵之，是儒生聞葺之言，無一粲之值。」最後重申：革命黨人的責任，決不限於推翻清政府，即「不卒之於民族主義，而卒之於民權、民生主義」，「必完全貫徹此三大主義而無遺」。

孫中山這次整頓同盟會的努力，形式上收到了一定效果。宋教仁、張繼等人放棄了「變名更署」的主張，表示繼續留在同盟會內。張繼還在給章太炎的覆信中說：「同盟會之變名更署，鈍初主張甚力，後乃悟名目上之問題特朝三暮四之術耳。吾隸於同盟會，學從其朔，在我個人顧名思義或藉可保持革命精神。」但是，整個說來，對於同盟會怎樣造成「靈敏機關」，革

命黨人如何成為「堅固不拔之群」，除在組織上決定暫時停止吸收會員外，孫中山並沒有提出更有力的措施。這樣，同盟會固然保住了它的形體，卻未能從根本上發生新的轉機。

首先，在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的過程中，同盟會上層領導人的意見仍極不一致。宋教仁不願孫中山的反對，堅持主張責任制。選舉臨時總統時，作為湖南代表的譚人鳳拒絕投孫中山的票。同時，對於孫中山主張繼續北伐的正確意見，黃興、胡漢民特別是汪精衛都極力反對，最終迫使孫中山妥協，以「虛位以待之心」，企望通過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達到「和平之目的」。

其次，同盟會內各行其是的狀況絲毫沒有改變。如同盟會四川支部不經本部同意，逕自改為「共和黨」，又如在定都問題的激烈爭論中，李烈鈞、孫毓筠、蔣尊簋等無視孫中山建都南京的提議，聯電主張定都北京。而南京臨時參議院，「固多同盟會會員，而與政府終不免形格勢禁」。這種情況，多年後孫中山仍為之憤慨不已，說：「余為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為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

最後，組織上的分裂有增無減。孫武、劉成禺、時功玖等因在南京臨時政府中未得到安排，對黃興有意見，便糾合一些舊官僚和立憲黨人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日發起組織「民社」，推黎元洪為首領，主張建都武昌，公開與南京臨時政府相對抗。與此同時，景耀月一面拒絕就任教育次長，一面與歐陽振聲、殷汝驪等以「共和統一會」為中心，聯絡「國民共進會」、「政治談話會」合組成「統一共和黨」，宣稱「以鞏固全國統一，建設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趨勢，力圖進步為宗旨」。此外，雲南支部張儒瀾、李金木等一部分會員，也發起成立了「中華

民國聯合會」雲南分會，與同盟會相分離。

同盟會在南京臨時政府期間所以益形崩離析，除了政見分歧、地域觀念、宗派思想和權力分配不均等種種因素外，仍與革命黨人的思想認識密切相關。孫中山曾說過：「自己已執政權，倘又立刻組織同盟會，豈不是全國俱系同盟會，而又復似專制？」同盟會著名的政論家徐血兒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說：「當時同盟會以天之驕子，首執國政，有組織政黨內閣之勢與組織政黨內閣之力而不為者，非弗善政黨內閣也，不欲以政權私於一黨，而博攬群賢以共治也。」正因為這樣，孫中山想依靠南京臨時政府來推行同盟會的革命方略，在實際上也就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要求革命政黨加強統一領導，以適應千變萬化的複雜局面。同盟會卻恰恰相反，在革命緊要關頭更加渙散了。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不久，同盟會本部發表宣言，雖然指出了「元兇尚在，華夏未清」，應「長驅河朔」，以「建立民國」，但卻表白革命黨人將於「功成事遂」之後引退，「散處朝市或悠悠林野」。³⁹同年十二月，同盟會本部在上海召開臨時會議，旅滬各省分會負責人也參加。如上所述，這次會議事實上並沒有阻止「意見不相統屬，言論歧為萬途」的現象繼續發展，相反，卻更加嚴重了。

39 《同盟會本部宣言書》，《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黃興是同盟會中的軍事領袖。他在南京臨時政府期間，和孫中山配合得基本上是不錯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都支持了孫中山。他在臨時政府中，任陸軍部總長，「兼參謀總長，軍事全權，集於一身，雖無內閣之名。實各部之領袖也」。但是，這樣一個重要領導人，在民國建立初卻有了功成隱退的思想，他在一個致袁世凱的電文中說：「吾輩十餘年兢兢業業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圓滿之幸福。今目的已達，掉臂林泉，所得多矣。」⁴⁰他在一九一二年三十九歲生日時寫的詩中，也道出了這種心情：「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⁴¹在黃興看來，只要把滿人統治換成漢人統治，革命就算達到目的，就可以「大風歌罷不如歸」了。這樣，當然就失去了對袁世凱的戒備。在孫中山主持南京政府期間，他是力主和袁世凱妥協的。南北議和，政權「統一」於袁世凱手中，黃興負有一定的責任。

在對待袁世凱的問題上，孫中山後來在思想上也很混亂。二月十七日，他在復譚人鳳及《民立報》館的電中，解釋讓位於袁世凱的原因時說：「吾黨不必身攬政權」；又說：「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文前茲所誓忠於國民者，項城亦不能改。」遵守民主制度，把自己視為「公僕」，這是對的；但是，認為任何人，包括袁世凱，也能像自己一樣「守憲法，從輿論」，這就大錯特錯了。

綜上所述，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後已處於四分五裂、十分渙散的狀態，而孫中山也無力改

40 《臨時政府公報》第二十四號《附錄》。

41 黃一歐：《回憶先君克強先生》，《辛亥革命回憶錄》（一），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第一百三十七頁。

變這種狀態。處於這種狀態的革命黨，當然不可能制定堅定的反帝政策、土地政策和鎮反（鎮壓反革命）政策，因而也就不可能領導南京臨時政府走向勝利。

孫中山在後來解釋這段歷史時曾沉痛地說：「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讓。然弟不退讓，則求今日假共和，猶未可得也。蓋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奪利之思想，其勢將不可壓。弟恐生出自相殘殺之戰爭，是以退讓，以期風化當時，而聽國民之自然進化也。」⁴²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失敗於領導集團的內訌，辛亥革命失敗於同盟會組織的渙散。同樣，都是領導問題。這些深刻的教訓，對孫中山後來的轉變是有教益的。

二、讓位袁世凱

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後，面臨的鬥爭任務非常艱巨。其中，解決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是很緊迫的問題。武昌起義爆發後，一貫敵視中國革命的外國帝國主義，藉口保障外債償付，乘機完全攫奪了中國海關稅收，不讓有一文錢供臨時政府支配。各省地方稅收，為數不多，供應各地軍政府尚嫌不夠，更談不上接濟中央革命政府了。依靠華僑贈款和國內民眾的捐助，數目畢竟有限，不能最終解決問題。所以，臨時政府剛成立，就迅速出現巨大的財政需要和嚴重的財政困難。他們面對嚴重的財政危機，不僅難以支付下屬十餘萬部隊的軍餉，連臨時

政府本身的日常開支也無法保證，一度竟出現了財政部金庫只剩下十元錢的危急局面，時刻面臨著軍隊解散和政府崩潰的危險。

比財政危機更使孫中山難以招架的，是對付來自各方面的要他把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的強大壓力。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為了挽救它的頹勢，在帝國主義的授意下，被迫起用一度解職在家的袁世凱，任命他擔任了掌握軍、政大權的內閣總理，負責鎮壓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乘機大施詭計。他一方面借革命力量的聲勢，逼清王室退位；一方面派重兵直逼武漢三鎮；同時又放出和談的口風，逼迫革命派妥協，企圖一箭雙雕，既奪得清朝政府的最高權力，又迫使革命派屈服。

在袁世凱軟硬兼施的進攻面前，又加上立憲派人和一部分舊官僚的鼓動下，有些革命黨人墮入了迷霧。他們錯誤地把袁世凱看做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同意如袁世凱幫助推翻清王朝，就推舉他擔任共和國大總統，以求儘快結束戰爭，換取革命的早日「成功」；並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在漢口舉行的獨立各省代表會議上，通過了相應的正式決議。緊接著，又在上海開始了南北和議。這樣，當孫中山從歐洲回到國內，就發現自己被置於一



以擁護共和要脅清政府的袁世凱。

個十分被動的境地，一方面他被各省代表推舉為南京臨時政府的領袖；另一方面又被作為過渡階段的政府首腦看待。各省代表原先通過的正式決議依然有效，孫中山暫時只是「虛位以待」，只要袁世凱反戈倒清，總統職位仍將由袁世凱擔任。

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年）是近代中國反動的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於河南項城的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伯祖父、父親、叔父都是鎮壓撚軍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在一八九五年，他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訓練反革命武裝——「新建陸軍」，從而逐步掌握了軍權。後來，他要弄卑劣的兩面派手法，破壞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戊戌變法，又依靠新式的反革命武裝，在山東勾結德國侵略軍，血腥地鎮壓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他還利用職權，將津浦、蘇杭甬鐵路出賣給德國、英國，進行種種賣國活動，成為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

袁世凱因鎮壓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有「功」，被清廷拔擢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主持編練北洋常備軍（簡稱「北洋軍」），成為清政府中最有實力的人物。一九〇八年，光緒、慈禧



宣告退位時的溥儀和他的父親攝政王載灃。

太后相繼死去，次年袁世凱被逐回原籍「養病」。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政府為了挽救它的頹勢，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公使團授意下，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撫事宜」。接著，帝國主義又配合袁世凱，迫使清政府再三讓步，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向他交出一切軍政大權。

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印象素來不好，覺得此人「狡猾嬾變」，「可能遲滯革命行動」，⁴³甚至認為他是一個「巨奸大慝」，⁴⁴是一個靠不住的危險人物，他很不贊成將革命政權拱手讓給這樣一個陰險的人。回國之初，他曾明確表示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決不中途妥協退讓，並且還積極著手組織北伐。但是，當時的客觀形勢已不是孫中山所能左右了。他所面對的，是擁有強大的武裝又有豐富統治經驗的袁世凱。早在武昌起義前，袁世凱就已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勢力，他不僅控制著清政府賴以統治的支柱——北洋六鎮新軍，手下有一批為其效勞的滿洲貴族和漢族官僚，具有極其狡猾的政治手腕，而且得到帝國主義的欣賞。

辛亥革命爆發後，帝國主義列強看到清朝政府難以再維持下去，便決定採取「換馬」的辦法，拋棄清政府，扶持袁世凱作為他們統治中國的新的代理人。帝國主義的這種態度，終於迫使載灃不得不違心地起用袁世凱，使其得以東山再起。在這以後，帝國主義不僅在整個南北議和過程中暗中為袁世凱出謀劃策，而且公開告訴革命黨人，只有讓袁世凱當大總統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可。

43 陳三井：《法文資料中所見的孫中山先生》，載黃季陸：《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臺北一九五〇年版，第二百八十四頁。

44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一），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第二百頁。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立憲派見武昌起義後革命的風暴迅速發展，清政府的覆滅已不可挽回。為了阻止革命的深入發展，和革命派爭奪權力，也願意支持袁世凱出來控制局面，以造成有利於自己的形勢。

上述情況對資產階級革命派造成很大壓力，特別是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支持，對革命派的壓力最大。因為自中日甲午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一直在發展著。帝國主義隨時可能瓜分中國這一可怕的陰影，時時籠罩在所有愛國者的心頭。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武裝推翻清王朝的鬥爭中，十分害怕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北軍政府發佈的一份文告，就曾告誡人們不要冒犯洋人，認為「若是害了外人，各國都來與我們為敵，那就不得了了呢」。這樣，在人們普遍害怕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希望儘快地建立共和政府，並取得帝國主義承認的情況下，帝國主義明白表示只有袁世凱做總統才會得到他們的承認，這也造成了孫中山回國後，就被置於十分被動境地的局面。再加上當時同盟會的渙散狀態，也對孫中山極為不利。

武昌起義前夕，由於一連串起義的失敗，同盟會的力量損失很大，內部團結也趨於渙散，對武昌起義的爆發，思想準備不足，再加上革命黨人對起義後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缺乏應付的經驗，沒有能夠牢牢地掌握住革命的主動權。相反，企圖通過讓位袁世凱，以求早日結束戰爭，使革命早日「成功」，以換取革命的廉價勝利的想法，在革命陣營內部佔據了上風。一當時南京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從派系到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認為只有利用袁世凱推翻

清政府於革命有利。」有人甚至這樣逼問孫中山：「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這個職位嗎？」

當時的形勢，確實使孫中山除了同意向袁世凱妥協，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況且孫中山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害怕帝國主義干涉的恐懼心理。他在美國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不是立即回國領導革命，而是先赴歐洲從事外交活動，認為對英國外交的成敗，將決定革命的存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害怕中國革命會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回國以後，他的這種擔心並未消除。與此同時，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反革命的真實面目當時還缺乏足夠的認識，他又想到利用袁世凱，「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的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⁴⁵，而避免流血，結束戰爭。加上孫中山對



孫中山與袁世凱任命的內閣總理唐紹儀在總統府前合影。

袁世凱這個「漢人」也抱有一些幻想，認為「賊（袁世凱）本漢族，人情必思宗國，而總統復非帝王萬世之比，俯與遷就，冀其自新」。⁴⁶從這樣考慮出發，孫中山主觀上並不怎麼反對通過議和，利用袁世凱迫使清廷退位，來達到「建立民國」這一目標。加上當時的形勢，他敵不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終於被迫同意如果清王室退位和宣佈共和，他將把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迫於革命形勢和在袁世凱的催逼下，清王朝頒佈了退位詔書，宣告了這個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封建王朝的覆滅。接著，袁世凱向南京臨時政府虛偽地宣佈，他承認共和制度，保證「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十三日，孫中山履行自己的諾言，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十四日，得到臨時參議院的批准。



圖為清朝的龍旗和清廷頒佈的退位詔書。

孫中山雖然被迫同意將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但他仍抱有戒心。為了防備袁世凱撕毀協議，背叛共和，他在提出辭職的同時，附加了三項條件：「（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解職；（三）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佈之一切法制章程。」⁴⁷孫中山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些條件，把袁世凱調離經營多年的京津老巢，迫使他到革命力量相對集中的南京就任，並用《臨時約法》來加以約束，以防止袁世凱上臺後，推翻民主共和，實行專制獨裁。

奸詐的袁世凱當然知道孫中山的用意，他一面推三托四，遲遲不肯南下，一面暗中指使親信在北京製造「兵變」，乘機散佈自己一旦南下，北方必定發生大亂的論調，作為他不去南京就職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與唐紹儀及南京總統府職員合影。

的藉口。帝國主義也再次公開出面支持袁世凱，紛紛以保護使館為名，調兵入京，故意製造緊張空氣，對孫中山施加壓力。許多立憲派人和舊官僚也都為袁世凱幫腔，連一些革命黨人也隨聲附和，主張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孫中山又一次陷於孤立被動境地，不得不再次讓步。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四月一日，孫中山正式辭去臨時總統職務。第二天，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了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的決議。這樣，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南京臨時政府，僅僅存在了三個月就不幸夭折。

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大野心家袁世凱篡竊後，意味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又在中國開始建立起來。「中華民國」成為一塊空招牌，新瓶裝舊酒，「內骨子是依舊的」，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依舊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頭上。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與內閣成員赴參議院舉行正式解職禮時合影。前排左二起：居正、黃鐘瑛、黃興、唐紹儀、孫中山、王寵惠、蔡元培；二排左二胡漢民、左五林森、左六徐紹楨。

辛亥革命並沒有出現孫中山所預想的「中華民國將永久存在」，⁴⁸「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⁴⁹的美妙情景。它沒有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整個中國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沒有給中國帶來獨立、民主和富強。

辛亥革命之所以得此結果，既是時代條件所局限，也是由於中國民主革命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他們缺乏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足夠的勇氣，不敢也不能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綱領，甚至幻想與革命敵人妥協來實現中國的民主政治。當時孫中山並沒有認識到帝國主義的階級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因此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常常向這個或那個外國壟斷資本集團尋求友誼，呼籲援助。軟弱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者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對外宣言中，總是表示承認帝國主義在華既得利益，期望以此換取帝國主義的「中立」以至「援助」。他們又與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非常害怕並且極力壓制農民群眾起來革命。孫中山雖然提出了「平均地權」，但是，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並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制度的改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不僅沒有發佈分配土地的命令，反而三令五申保護地主階級，讓他們參加各級政權。有些地方的革命黨人，甚至利用暫時掌握的政權，嚴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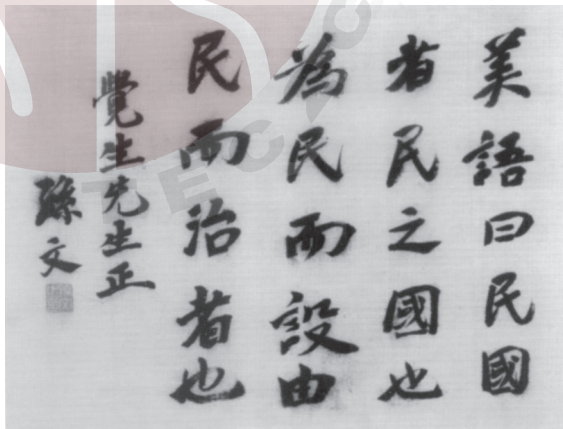
48 孫中山：《中華民國》（The Chinese Republic），紐約《獨立雜誌》一九二二年九月英文版。特引自陳福霖：《美國〈獨立雜誌〉所刊孫中山先生的三篇著作》，《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臺北一九七五年版，第三百三十四頁。

49 《自巴黎致民國軍政府盼速定總統電》（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國父全集》第三冊，臺北一九七三年版，第一百六十三頁。

禁止並且出動軍隊鎮壓貧苦農民的抗租鬥爭，極力維護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革。辛亥革命沒有實現這個變革。

此外，他們在武昌起義後大講「咸與維新」，對混入革命陣營裡的大批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對打著「共和」旗號，鑽進革命政權內部摘桃子的改良派，居然不念舊惡，握手言歡；即令像袁世凱這樣的反動頭子，僅只口頭上承認共和，便可以化敵為友，甚至把大總統的位置讓給他。這樣，自然就不能真正發動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是農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因此，在國內外反動勢力倡狂反撲面前，他們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最後只有退卻和妥協，喪失了政權。

應該指出的是，辛亥革命的悲劇性結局，是由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條件所決定的，而在形成孫中山終於「讓位」給袁世凱的這一歷史事件中，有許多不利的條件，卻是由於革命黨人主觀認識上的錯誤，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不足和缺乏實踐經驗造成的。從武昌起義到孫中山「讓位」這段歷史為時不到半年，但它的內容卻極為豐富。其中有著豐富的經驗教訓可以總結。



孫中山為內務部次長居正題詞。